

# “高价”政府采购频现的背后

近期,一些地方政府“阳光采购”频频引发争议:长沙市工商局办公大楼空调系统安装中标价109万元,可结算价却高达875万元,高出8倍还多。长沙市另一个政府采购项目,实际结算价比公示价高出千万元。在此之前,昆明市有关政府职能部门被曝集体“高价采购”,而长春市购进一台电脑接近3万元……本为引进竞争、节省支出的政府采购,究竟生了什么“病”?

## “阳光采购”有潜规则

在长沙市工商局办公大楼建造中,有十余个政府采购项目,实际结算价远远高出中标价。其中,这栋大楼的空调系统安装中标价109.8万元,结算价则高达875.5万元,高出8倍。对此事件,当地数位退休老干部向省纪委、省工商局等部门实名举报,但据记者了解,直到现在依然没有查清查明。

长沙市还有一个废弃物污水处理项目,政府采购时的中标公示价为5346万元,但实际结算价至少比中标价高出上千万,这引起了审计部门关注。

记者调查发现,这个项目开标后,多家投标公司质疑招投标程序涉嫌违规。据参与竞争的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介绍,招标公告曾规定:“项目设投标报价上限,上限值在开标前7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各投标人。”但在开标前3天,招标方突然取消了投标上限值。他们表面上以较低价格中标,暗地里却以远高于中标价结算。



与“明低暗高”的招标手法相比,日常办公支出的“高价”采购更易被发现。昆明市财政局、纪委和公安局等多个部门近期被曝集体“高价”采购。其中,昆明市财政局采购4台服务器、68台台式机、8台笔记本电脑,成交价57万余元,比市场价约高一倍。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采购125台笔记本电脑,每台6760元,而中标机型市场价为5099元,一单生意就比正常价格高出21万元……

但面对种种质疑,昆明市有关部门负责人不以为然。昆明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政府采购办公室主任陈一凡解释说:“我们承诺,采购决无暗箱操作。市财政局、审计局、监察局是我们的监督单位。”他表示,昆明市的政府采购,完全是按法定程序进行,信息“公开、公正、透明”,是“阳光采购”。

在昆明曝出办公用品“高

价”采购之前,长春市一部门的政府采购清单中,也出现近3万元的一台电脑。面对质疑,昆明和长春有关部门都给出相同的“答案”:买高配置设备是“工作需要”。

“什么工作需要?一些地方政府采购竞标,比的不是价格、不是质量,而是关系。”曾参与政府采购的昆明市供货商李某称,“买的东西次一点,供应商赚一点,回扣拿一点”是一些地方政府采购的“三点”规律。少数负责采购的公职人员甚至会和供货商“共谋”赚取差价。

## 审批、招标、公告 环环皆有“漏洞”

财政部数字显示,我国政府采购规模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2002年为1009.6亿元,2009年则突破7000亿元。财政部有关人士坦承:由于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起步较晚,存在监督不到位的问题。

“监督不到位具体体现审批关、招投标关和公告关都有漏洞,使一些地方的监督形同虚

设。”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傅大中说。

在“审批关”中,一些职能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有关专家说,在昆明市财政局采购过程中,财政局既是采购需求人,也是审批人,还是监督人,角色上的交叉使得财政局是否能有效地履行监督职能遭到质疑。

在“招投标关”中,一些地方只是走个程序,实则猫腻多多。湖南一位多年参与政府采购的厂商说,因缺乏监督,他们多次遭遇一些地方政府采购人提前透露标底给“自己人”,合伙商量“围标”、“陪标”等早已不是秘密,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几家企业长期垄断政府采购的局面。

据知情投标企业向记者透露,在长沙市高出中标价上千万元的政府采购事件中,开标前3天突然取消报价上限值,明显有违招投标法。按法律规定,这种情况应在开标前至少1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投标人。不仅如此,长沙市政府采购办接到投诉后,虽认定违规情况属实,却以“不影响招投标结果”为由驳回投诉。此后,相关方再依程序向省级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省级机关要求市里“重新作出投诉处理决定”。这次长沙市采购办很快重新认定“此次采购活动违法”,但此时距中标结果公示已有近半年时间,采购已结束,成为无法纠正的事实交易。

政府采购的最后一个流程是“公告关”,本意是公开让社会审核。湖南省法学专家陈杰人表示,像昆明和长春的“高价”采购,只简单公布招投标结果,不公开事前、事中情况,公众很难发现个中“道道”,监督也就无从谈起。

## 立体监督: 让“潜规则”无处遁形

据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等专家介绍,我国政府采购法自2003年实施以来,一直未出台相关的实施细则,存在一些法律盲区,为

一些“灰色交易”提供了可乘之机,导致“阳光采购”不“阳光”,甚至滋生腐败。要刹住政府采购中的“歪风”,应在制度和程序上“补漏”,尽快出台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在制度“补漏”前提下,还应让公众监督参与到政府采购中,改变以往单一行政监督模式的弊端。

为防止“采购腐败”发生,近年来山东烟台市探索建立采购事前需求论证制度,节约了大量财政预算资金。烟台市一数字化城市管理工程采购项目,采购人提出的预算为4000多万元,但经过各方参与的事前论证,预算最终被“砍”去了一半。

“实践证明,在财政审批中,引入社会监督十分必要。”傅大中等专家认为,财政部门应将政府采购预算细节在网站和媒体上公示,如果公众有异议,要吸收专家等重新调查,或举行听证会,有效规避“审批关”中出现滥用职权行为。

“公告关”也不能一“告”了之。汪玉凯等人表示,除了公众监督外,审计、监察机关应加大过程监督,及时向公众通报结果,取信于民。“建议对政府采购各个环节的责任人向社会公示。”湖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院长王学杰说,只有严格监督和惩戒机制,“阳光采购”才能名副其实。

据新华社



本版均为资料图片



远来的和尚会念经?

图/李二 新华社

# 新闻时评

编辑 陈培营 杨怀锁 电话 67655282 E-mail: szxw@zynews.com

## 解决高房价需治本之策

最近几年,国内大城市房价不断上涨,居民解决住房问题难度越来越大。今年以来实施新的宏观调控后,社会舆论先是指责开发商暴利,后又质疑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房价问题已经从一个市场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

纵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首尔、新加坡、香港等国际大城市,平均房价比北京、上海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但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高房价并没有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中国房价问题为什么如此引人关注?有必要认真分析中国高房价形成的原因,找到治本的办法。

首先,财税制度不合理是造成高房价的重要原因。按我国现行的财税体制,增值税中央拿走75%,省级拿走10%左右;所得税中央拿走60%,省级占20%左右。这意味着各级地方政府,即使下最大的力气发展产业,也只能从税收中分得不到20%的收益,而发展房地产、卖地的收入基本上全部归地方政府所有。这样的财税制度设计,促使逐步形成“土地财政”。

分税制改革前的1993年,当年全国财政总收入中,中央只占22%。为此,中央做出实行分税制改革的决定,设计的目标是用20年左右的时间,使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达到40%。经过16年的发展,到2009年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已达到52.4%,大大超出了改革的预期。相反,地方财政收入占比大幅下降,地方财政遇到困难,首先想到的是靠卖地来弥补。

所以,只有下决心改革现行财税制度,调动地方政府发展产业的积极性,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其次,保障房制度不到位是造成高房价的核心因素。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全球主要大城市看,居民解决住房的主要渠道是保障房。比如香港的房价比北京、上海高几倍至十几倍,但香港55%的民是通过公屋和居屋两种保障房来圆住房梦的;伦敦、巴黎、马德里是世界房价较高的几个城市,但这些城市超过五成的居民居住在保障房里;新加坡更有70%以上的居民住在政府的保障房里。这些国家和城市房价地价都很高,但是当地政府把超过三分之一左右的财政支出和土地收益的绝大部分用在建设保障房方面,50%以上的居民通过政府的政策保障房实现“居者有其屋”。

反观我国,从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保障房占全部城镇住房建设总量的比例都相当低,即便是近两年大力强调建设保障房,保障房的开发面积也只占全国城镇住房建设总量的百分之几。城镇大多数中低收入居民通过保障房解决住房问题无望,便把几代人的积蓄拿出来购买商品房住房。这给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所以大家都痛恨高房价,房价成为社会问题也就不足为怪。

如果中央明确5年内各级地方政府保障房建设达到房屋建设面积的50%,土地收益的绝大部分和财政支出的相当比重用于建设保障房,并且将这五个指标作为政绩考核的刚性指标,完不成任务就追究当地政府主要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责任,相信中国的房价问题就不再是社会热点和社会问题。此外,居民收入相对偏低和住宅土地供应不足也是高房价形成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GDP保持年均9.8%的增长速度;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6%;房价从1987年开始,年均增长11.2%,而同期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要远远低于前面三项指标的增长速度。改革开放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居民收入,实现共同富裕。而现实情况是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跟不上GDP和房价增长速度,导致居民相对购买力逐年下降,老百姓自然对高房价怨声载道。

来自国土资源部数据表明,2009年城镇人均住宅用地面积只有1平方米左右,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差不多。但十几年来,人均住房面积在增加,从中可以看出,全国城镇住宅用地供应是趋紧的,在供应趋紧的情况下,价格走高就不难理解了。因此,只有加大住宅用地供应量,提高人均住宅用地指标。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目的。王健林

## “魅力女人班” 经济利益催生的怪胎

华中科技大学日前开设了一个“魅力女人班”,专门教女性朋友修炼“女人味”。此消息一出,引起一片哗然。记者昨日调查发现,该“魅力女人高级研修班”系华科聚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策划组织,需交纳26800元,周末到华中大上课,其中有4天到北京、5天到日本观光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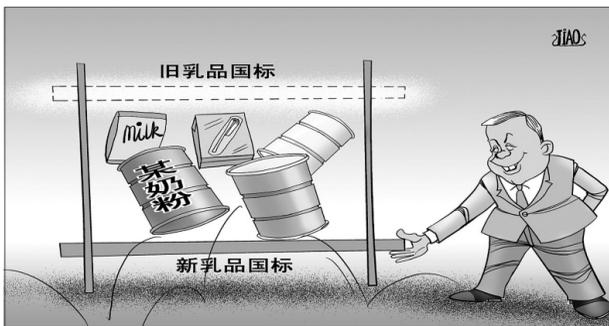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的性格特质是与生俱来的,后天的“改造”不是没有作用,但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正是大千世界存在差异的众生相才有了缔造传奇的可能。据项目负责人表示,以前都是针对EMBA男性总裁开课,今年首次针对女企业家、男企业家的夫人、职场女白领开设。

细想之下不难发现,所谓的“魅力女人班”只不过是某些心术不正之人造就的圈钱产业链而已。目前培训市场此类研修班,大都由招生中介和高校签订协议,由高校提供教室场地,中介打着高校的旗号在招生。某些公司、招生中介、高校在里面扮演着“四马分肥”的角色,都在获取的“聚宝盆”中分取一杯羹而已。“魅力女人班”

只不过是经济利益推动下催生的怪胎。

“魅力女人班”也折射出社会存在的问题,作为女性仍然没有完全甩掉弱势群体的帽子,法律虽然赋予女性与男性同等的权力,但社会仍然用有色眼镜看人,提供给女性成功的机会太少,竞争压力下女性开始寻求实现自身梦想的捷径。“魅力女人班”的开设正所谓“投其所好”,然而其形成是建立在社会问题基础上的,因此是不健康的,虽说是一个“恶打”,一个愿挨”,然而女性只是被宰割的羔羊,真正成全的只是公司、招生中介、高校一方的利益罢了。

因此女性应该明白:个人的兴趣爱好、接人待物等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从小历练,自己潜心读书获取知识是其中的渠道之一,“魅力女人”又岂能靠花钱速成,那是买不来的。这种炒作无疑是圈钱,只不过披上了一件华丽的外衣。社会要鼓励女性自好,怎能唯利是图、助纣为虐。再者,高校要给女性提供更广阔的舞台和机会,唯有如此,经济利益推动下催生的畸形“魅力女人班”才没有存在的空间。 谭正正



## 缺乏耻感的政治“贴金术”

中石化大连石化分公司,日前召开了“7·16”火灾事故抢险救援表彰大会。当灾难事故发生,常识告诉我们,从财政上有人要为此买单赔偿,从法规上有人要为此付出刑事责任,从道义上有人要为此良心不安,而中石化大连石化分公司却颠覆了这种常识。在中石化这种垄断企业的茶几上,没有杯(悲)具、没有餐(惨)具,他们只有洗(喜)具。

他们居然好意思在脸上贴金——公众很生气,中石化很淡定,板子未打先给糖,自弹自唱的表彰既漠视灾情汹汹,也无视国家相关问责法规的尊严,说明了社会正义在某些强势垄断利益集团的阵地上失守。这是一种很可怕的暗示,强势垄断企业捆绑了各方利益集团的博弈格局,捆绑了国人承受灾难折腾的神经,他们端足了国字号架子,似乎从来都没考虑过耻感在

哪?一次次撒娇或撒泼的得逞,助长了他的骄横霸道,他们不仅占尽政治优势、资源优势、市场优势,而且又不担风险地折腾国资,哪怕闯了祸失了火,连稍微挪弄公众的挡箭之盾牌——“反思的花枪”都不屑于玩一把,却大搞起正面表彰,如此悲喜转换,粉饰太平,将一个国家企业的基本伦理与道德血液生给“污染”了。

目前在国内,对诸多灾难的事后责任追究惩处,多体现在以做效尤的惩戒上,很少有官员因耻感而惶惶不可终日者。而闻过不罚、闻祸反笑,更是颠倒是非伦理之最,凸显了垄断企业在中国只需摆平检查组,无需向公众交代现实。我们所期待看到的,是让每一个灾难事件必须有具体的人出来担责成为常态,而不是厚颜无耻地躺在事故的功德碑上弹冠相庆。杨光志

## 全部合格

今年6月1日起,由卫生部批准正式的乳品安全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新国标中,蛋白含量每100克含2.8克,这个数字低于国际标准3.0克,也低于1986年旧国标的2.95克;每毫升牛奶中的菌落总数,新标准由原来的50万上升到了200万,比美国、欧盟10万的标准高出20倍,被业界惊呼为一夜倒退25年。更有舆论指出,这个乳业新国标让“中国原奶质量降到了全世界最低”。

焦海洋/图

## 教授想当官是“科举思维”复辟

近年来,官本位思想在科技界日益泛滥,“研而优则仕”的现象日益突出,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四位学术带头人现身说法:科学家为什么想当官——本需静心,却难静心。(8月9日《人民日报》)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仍可骄傲地数出几个有世界影响力的科学巨匠,而如今改革开放30多年,但就算是在我们的优势领域,也没能出几个世界级的大师。

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教授在山东大学作学术演讲时表示,“培养1000个教授的花费跟中国所有高校校长请客吃饭的钱加起来差不多。”这句话揭示出一个现象,当官可以进行资源交换,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去跟别人换取自己需要的资源。而这一点,显然是做个学术型的教授无法做到的。

君不见往往一些科研项目的第一带头人并非科研实际操作者,而是个带官衔的人?君不见往

## 政委假装擦汗 我们假装汗颜

一自称武汉交警的男子向网络爆料:8月3日,10名交警接通知后在烈日下等了30分钟,等来武汉市交管局政委王斌,随后交警们排队让他擦汗。昨晚,武汉市交管局新闻发言人陈耀称,该局官员慰问路面交警是每年惯例,但并未让交警专门在烈日下等30分钟。(《新京报》8月10日)

根据当日武汉媒体《长江商报》发表的图片显示,王斌拿着一块白色毛巾给一名交警擦汗,该交警旁边还有多名交警排队等候。看到这样的图片,切入现实的语境,恐怕再也找不到比作秀更适形容这一幕的词汇了。

某种意义上说,作秀就是作秀,纵然是武汉交管局再三否认,也都改变不了“擦汗门”作秀的本质。如果说交管局领导是真心想要下去给执勤在一线的交警们擦汗,大概也就不需要提前下通知,让交警们排成长队、挨个接受领导的“擦汗慰问”了,也大概就更不需要兴师动众让一众记者跟随拍照宣传了。其真实目的是地,这样的“秀”也未就是王斌政委本人喜好的结果,不能以此就指责这位交管局官员“好这一口”。对于他来说,这或者就只是一种惯例性、程式化的工作。而实际上,仔细想想,这样的事情几乎是每天都在发生,领导下基层慰问,前呼后拥者相随,拍拍照、领导送东西、跟群众握握手,一哄而散。慰问是一种形式,“擦汗”或者“送礼”只是形式不同没有本质区别。不仅政府机关,在企业也是如此。今天,一个擦汗的交管局政委被曝光了,处在舆论批评的风口浪尖上;但在昨天、前天乃至明天,又有多少个“擦汗”的领导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呢?

“擦汗门”被媒体曝光后,舆论的批评如潮,“擦汗的政委同志”立成“舆论公敌”,擦汗门大有成为网络流行语的架势。但其实,包括很多批评者在内,对于如此之类就真的是“惊诧莫名”吗?我想,并不是这样。无数类似的一幕幕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上演,“擦汗门”不过是一个极端和偶然的个例罢了。

对于“政委擦汗”,武汉交管局并不承认是作秀。实际仔细想想,当一种公认的“秀”经常出现,成为官场或者职场惯例,成为某种文化式、道德性的潜规则,被世人所熟知和默认,也就不能再称之为“秀”了。“领导慰问秀”出场一千遍一万遍,时间久了,谁还能再当回事?“擦汗门”首次出现引起“惊呼声”一片,但如果“擦汗”擦得多了,也就不稀罕不奇怪了。重复的次数多了,谬误都有可能成为真理,这论是“擦汗”。

所以,很显然,“擦汗门”隐喻的味道不过是——政委假装擦汗,我们假装汗颜,真正的“问题”无人关注,大家吵吵两声兴趣淡了,这事儿也就散了。

陈一舟

往一些论文发表的时候,什么“长”都是第一署名作者?在这种学术语境和行政语境下,试问你想做学问还是想做官?即便是你想静心做学问,如何能静得下来?再深一点说,时下“研而优则仕”现象的泛滥,其实是科举思维的复辟——“书中自有黄金屋”影响中国读书人几千年,“状元及第,衣锦还乡”的故事也深入人心,这是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思维。而这种思维,深深烙在中国教育的每一个阶段,也影响着中国科技界的人才走向——当官之后的面子、等级、人情,远比当一个科学家的成就感或荣誉感更直接更能令人满足。我们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高校及科研机构体制机制问题,而是该探讨如何能让科学家活得比官员更有实际价值更有社会地位更有物质尊严,这才是破除“研而优则仕”弊端之道。 张兮兮